

语言论文集

北京市语言学会编

商务印书馆



語言論文集

王

力

題



《语言论文集》编委会

周祖谟 许国璋 俞 敏 徐世荣
郭良夫 徐仲华 吕必松

YǔYÁN LÚNWÉNJÍ

语 言 论 文 集

北京市语言学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9017·1406

1985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35 千

印数 11,500 册

印张 9⁷/₈

定价: 2.00 元

目 录

学会是一个学科已经成年的标志(代序)	吕叔湘(1)
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语言学	叶圣陶(4)
我的治学经验	王 力(7)
回顾与希望	张志公(20)
汉法自动翻译扩大试验	冯志伟(22)
社会语言学与中国民族史研究	张公瑾(40)
论语言的声韵调分析方法	瞿霭堂(55)
男性直系亲属名称的类型比较	伍铁平(75)
模糊集合论与语言研究	尹斌庸(104)
前提和语义	周绍珩(113)
畬语和客家话	陈其光(129)
台语长短元音探源一得	罗美珍(139)
草开方言的浊音和入声	张归璧(146)
试论中日两国简化汉字的统一问题	费锦昌、张静贤(167)
现代汉语中词素对换的双音词	张寿康、林杏光(186)
试论词形的歧异和规范	朱炳昌(201)
浅谈成分分析法	黎泽渝(215)
说“句”	田小琳(231)
传统字源学初探	陆宗达、王 宁(249)

学会是一个学科已经成年的标志*

(代 序)

吕 叔 湘

首先祝贺这个大会的召开！

学会，它在中国还是比较新鲜的事物。以前，文人结社做诗，有诗社；也有一些政治性的结社，例如明末的复社。搞学问而有学会这样的组织，这在中国是最近几十年里才有的。在许许多多的学会里，语言学会成立得很晚，是个小弟弟。成立得早的，象地学会、化学会，大概都有七八十年的历史，语言学会直到前年才成立。

成立学会，标志着一个学科已经成年，成熟了。在这个学科还不很发达的时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还比较少，工作做得不多。那种情况下，不光是不觉得有成立学会的必要，即使成立，也不容易。从事这个学科的研究的人多了，工作展开了，就需要交流，成立学会也就成了从事共同研究的人的一种共同要求，成立也就容易了。语言学会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语言这个学科已经成年了，不是一个小孩儿了。

在全国语言学会成立的先后，有许多地区性的学会成立了。北京市语言学会是地区性的学会之一。在所有的地区性学会里，北京市语言学会是最活跃的一个。两年之内做的工作，确实是值得钦佩的。我早就估计到：全国性的语言学会大概做不了很多事情，因为会员散处全国各地，连开个理事会都不容易。地区性的学会

* 这是吕叔湘先生在北京市语言学会首届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呢,交通问题简单一些,开会比较容易,做什么事情可以说做就做。北京市语言学会能有这么多成绩,也是因为有这个条件。但是有了好的条件,如果不充分利用,做不出成绩来的可能性也还是有的。我想,全国有很多地区性的学会,不见得个个都象北京市语言学会这样有成绩,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向北京市语言学会致敬!

科学是一种集体事业。成立学会,也是集体事业的一种表现。假如各人搞各人的,那就无需乎搞学会。搞学会就是为了大家能到一起来交流心得,交流成绩,互相促进,互相帮助。除了成立学会之外,还有别的工作可以说明科学是一种集体事业。例如出刊物,出通讯,这样的工作,北京市语言学会也做了不少。再如编书目,编索引,这也证明科学是一种集体事业。

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报告一点消息,也许对大家有些帮助。《语言学论文索引》是“文化大革命”前就有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没有再修订。直到去年,《中国语文》编辑部的同志化了很多时间把它修订到1980年为止,而且把这论文索引分成了两本,一本是《语言学论文索引》,一本是《语言教学篇目索引》。这两个索引稿,已经送到出版社,很快就要付印。《语言学论文索引》由商务印书馆出,《语言教学篇目索引》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这两个论文索引出来,可能对同志们搞研究工作会有一些帮助。

关于语言学的书目,同志们多年来希望有这么一个工具。最近我们和各方面联系,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从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1912—1949)这一部分工作,北京图书馆做了,稿子已经出来,大概就可以付印了。解放以后的,他们没有搞,而且暂时也不想搞。北京语言学院正在搞,再加一把力,也很快能搞好。虽然分成了两段,没有合成一本,但是两段加到一起,正好是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的七十年的书目。

还有一个消息,同志们知道的可能不多,就是武汉大学要搞一

个语言材料库——把语言材料输入电子计算机储存起来，研究的人可以根据需要向计算机去要。他们打算先搞现代汉语，计划储存在计算机里的有老舍的《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离婚》、《龙须沟》、《茶馆》、《四世同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茅盾的《子夜》、《蚀》、《腐蚀》，巴金的《家》、《春》、《秋》、《寒夜》、《爱情三部曲》，叶圣陶的《倪焕之》，赵树理的《三里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登记》，夏衍的《工房》、《法西斯细菌》，鲁迅的《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呐喊》、《彷徨》，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蔡文姬》，共三十三种。预计 1982 年搞五种，1983 年搞六种，1984 年搞五种，1985 年搞十七种，字数总计五百二十六万八千字。现在《骆驼祥子》已经储存好了，共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逐字索引，一个是部首索引表，一个是频度表。三部分合起来，打算先由出版社印出来，稿子已经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了。有了这样的语言材料库，大家要研究什么问题就很方便了。

我就借今天的盛会，把上面的这些好消息奉献给有志于研究语言的同志。

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语言学*

叶 圣 陶

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在语言学的某些方面有了不起的成绩,象文字学、训诂学、声韵学。远的不说,说近代的,例如顾炎武先生,有《音学五书》,段玉裁先生,有《六书音韵表》,朱骏声先生,有《说文通训定声》。据专门家说,这些书都是很有价值的。再近的是章太炎先生,他的《章氏丛书》里有好几种,对于文字学、训诂学、声韵学作了精辟的研究。

刚才说起的那几位先生,他们在研究声韵的时候没有测验声音的仪器,也没有录音磁带。他们就拿几本古书“轧来轧去”——这里用了我们的苏州话,“轧来轧去”就是“横比竖比”。那几位先生“轧来轧去”就“轧”出了这么多道理,真是了不起。

后来,到了十九世纪末,甲骨文字出土了。甲骨文字对于考证古史有多方面的用处,它的出现使咱们对于古代的各个方面,比以前清楚得多了。在研究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方面,甲骨文也有极大的帮助。声韵学方面的书,我也想看看,可是咱们古代的声韵学实在不大好懂。我曾经请教王力先生,说我活到八十几岁,还一点儿不懂声韵学。他说“你不必懂。我是专门搞的,那叫‘天书’。”我说我不怕专门,还想懂一点儿,希望王先生能用五万字,很浅地很通俗地把中国的声韵学讲出来,给不懂声韵学的人看,使他们看了能懂。王先生回答说五万字不够。他最近告诉我说,这本稿子已经写出来了,只用了三万字,真了不起,希望能早日印出来。

* 根据 1980 年 6 月 18 日在北京市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整理。

我国古代对语言学的研究有它的特点，有它的独到之处。现在讲语言学，往往只讲外国这一家那一派的体系和理论，很少讲咱们中国的语言研究和咱们中国的语言学。我希望改变这种风气，拿咱们自己的特点跟别国的长处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咱们中国的语言学，就象把中医西医结合起来，形成咱们中国的新医学一个样儿。

还有一个语言学如何跟实用——跟应用相结合的问题。咱们研究理论，同时要研究应用，希望不要为理论而理论。为理论而理论，写出来的论文大概只有几个内行看。我写了一篇给王力先生看，王力先生写了一篇给另外一位专家看，就那么十位八位，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所以咱们一方面要研究理论，一方面要注意实用，要普及。注意实用决非实用主义，而是跟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边缘科学”。语言学和别的学科结合，也会出现边缘的东西。例如应用语言学，这与教学有关系；还有社会语言学——陈原同志写了一本书，叫做《语言与社会生活》，已经出版了，我看了，非常有意思，非常有用；还有心理语言学……此外还有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语言与信息的关系——语言要跟计算机联系起来，现在有好几个部门在研究，很有成绩。这些都是语言应用方面的工作，不妨参考别国的成果，结合咱们的实际情况，把这些处于边缘的学科也放在研究的项目里边。

现在语言的污染很不得了，跟大气污染不相上下。什么“考完了试”、“出完了操”、“报了销”等等，还是最小的污染。能不能来个统计，选定几种报刊，统计它三个月，看有几种类型的污染，然后发出警报，让大家想办法使自己不受污染，叫人家避免污染。语言的污染不得了！一九五一年提出了一个口号，“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人民日报》发了社论。现在污染却越来越大，希望大家来努力防止污染，家长，老师，各方各面的

人都来防止污染。

还有一个文字改革的问题。最近开了一个会，说简化字要整理一下。将来要跟信息传递、跟电子计算机联系起来研究，字形字音都要标准化。这个工作又是语言研究应当注意的一件大事。

我今天说的，主要无非是一个意思：咱们自己的好东西不要丢掉，不要妄自菲薄，不要一切都跟人家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咱们自己总有短缺的地方，短缺的，要老老实实参考人家的，不要妄自尊大，不要故步自封。咱们必须不断提高，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才能对四个现代化真能有所贡献。

我的治学经验*

王 力

近几年来,要我写自传、谈治学经验的不少,我一向不愿意写,不愿意讲。因为我的学术成就不大,我的治学经验未必值得借鉴。可是作为北京市语言学会的会员,会议要求我和同志们交流治学经验,我只好勉强来讲讲,向同志们请教。

我认为,所谓治学经验,主要是修养问题。所以今天我就主要来讲讲研究语言学应有的修养。

一、方法论

我常常对我的研究生说:科学研究并不神秘,第一是要有时间,第二是要有科学头脑。有时间才能充分占有材料,有科学头脑才能对所占有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我在学术上成就不大,就是因为我没有能够完全做到这两点。

解放后,我学习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懂得了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充分占有材料之后,要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种形态的内在关系。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说明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并根据它的发展情形去观察这个现象现在变成了什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我五十岁以后的科学研究帮助很大。

* 这是王力先生对北京市语言学会首届年会的全体代表所作的专题报告。

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指导

我在我的《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上说：“中国语法学者应该有两种修养：第一是中国语史学；第二是普通语言学。”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汉语研究，就能开辟许多新的园地。有人说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汉语研究工作，其实并不是什么开创性，只是普通语言学原理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

普通语言学里讲到很多很重要的道理。例如“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一个原理就很重要，我一生受用不尽。我从先秦古韵脂部中分出一个微部，主要根据是语音的系统性。要是从《诗经》用韵来看，好象独立不出来。因为微部字和脂部字合韵的相当多。但是我们得承认合韵。段玉裁在《答江晋三论韵》上说：“谓之合而其分乃愈明，有权而经乃不废。”

不承认合韵，很多韵脚就混成一团。段玉裁从真部分出文部来，文部跟真部就有合韵的，怎么又分出来了呢？主要是看系统，要看它们在系统中能不能分。

从前，我在我的《中国音韵学》里批判了戴震，说他唯心主义。后来我想：戴震是对的。他的话的大意是：按照系统来说，应该分的就分，不能因为有一两个合韵就不敢分；按照系统不能分的，就不分。戴震提出的原理，从系统来看是对的。作为一个原理，批判它是不应该的。他的阴阳入三分，也是根据“语言是一个系统”看出来的。他的古音韵研究得不够好，是因为他没有能按照他所提出来的观点去做。可见，系统性很重要。

段玉裁从真部分出文部来，但是没有阴声、入声和文部对转。入声摆到哪里去了呢？摆到脂部（第十五部）去了。章太炎从脂部入声中分出一个队部（黄侃叫做没部），这就是文部的入声。按照语言系统，阴阳入对应，还差一个阴声。我从脂部分出微部，使微、

物、文三部成为阴、入、阳三声对转，这是从系统性看出来的。两年前，我看到日本藤堂明保写的《汉字语源研究》采用了我的微部说，他说这样就有了系统性了。其实微部独立也不是我独创的。章太炎在《文始》里把“虽椎雷”等字归入队部^①，我受他的启发，从系统性出发，分出了微部。当然单凭系统性，没有材料证明也不行。我是从南北朝诗人用韵的实例中发现这个情况的，因为在南北朝，脂、微还是分开的。

两年前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讲普通话的日母字读音不应该是高本汉说的那样，是什么 [ʃ] 的浊音。当然不单是高本汉这样认为。很早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日母是 [ʃ] 母的浊音。我认为现代普通话的日母字的声母应该是 [ʈ] ^②，而不是 [ʒ]。这也是从语音的系统性考虑的结果。这当然要用几方面来证明，首先用语音实验证明。不必用机器，只凭听觉就行了。把“神”shen 中的 sh 念浊音，就不能念出“人”字来。当然用机器实验就更好了。考虑系统性也是一种证明方法。大家知道，现代北京话已经没有全浊声母了，[p]系、[t]系、[k]系、[tʂ]系、[ts] 都没有全浊声母，怎么在 [tʂ] 系中就会冒出一个全浊声母呢？从系统性来看，是不可能的。

再说，从语音发展看，浊上变去，古代浊音上声字会变成去声，但是次浊就不变。“柳”字的读音不会变为 liù，“忍”字的读音不会变为 rèn，“语”字的读音不会变为 yù。次浊上声不变去，这也是系统性的表现。因此，日母字不可能变为去声。如果日母是 sh 的浊音，为什么它的上声字不变为去声呢？

举出上面这些例子，意思是为了说明：“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原理我一生受用不尽。我用这个原理指导我的语言研究，相信是

① 章氏后来在《国故论衡》里，认为队是去入韵。

② 力注：最近我又认为不是 [ʈ]，而是 [ɟ]，见《中国语文》1983年1月号《再论日母的音值，兼论普通话声母表》。

有成效的。

普通语言学还有这样一个原理：语言的历史发展也是系统的。从一个时代变到另一个时代，是一个新的系统代替一个旧的系统。它不是零零碎碎地变的。所以我们研究语言史决不能零敲碎打，而必须对整个语言系统进行全面审查。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没有社会就没有语言。这也是一个普通语言学的原理。我们研究语言，就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我国古代的语言学家反对孤证。孤证之所以不可靠，是由于它缺乏社会性。

什么叫孤证？孤证就是缺乏社会性的偶而出现过的例证。例如：某个字在一个时代只在一本书中的一篇文章里出现了某一种意义，于是就以此为根据，给这个字提出一个义项来，这样的根据就是孤证。近些年来我看一些字典、词典的样品，就发现问题。举两个例子。有一本字典中，“信”有一个义项是“旧社会指媒人”，例证是《孔雀东南飞》中有个“信”字作媒人讲^①。这就是个孤证。因为，除了《孔雀东南飞》以外，没有哪一本书或哪一篇文章里的“信”字是当媒人讲的——至少我还没有发现。我查余冠英注的《乐府诗选》的解释是：“信，使者；断来信，就是回绝来使，指媒人。”他解释得很好。我们编《古代汉语》，经常讲一个字本来指什么，在这里受上下文的影响，指的是什么。这在语言学上叫做临时意义。

黎锦熙有句名言说得很好：“例不十，法不立。”他还说：“例外不十，法不破。”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是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写了篇文章，说上古时代没有系词，直到现在还在争论。反对的就找例证，其中有个别例子是成立的。但是“例不十，法不立。”例子那么少，是不是应该怀疑这本书经过后人篡改了

① 古诗《焦仲卿妻》：“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啊?《论语》中写子路问路于桀溺,桀溺问他“是鲁孔丘之徒与?”有人根据这个例子反驳我说:“这个‘是’字,就不是个指代词。”这个反驳是很有力的。但是后来我看到《史记·孔子世家》里,桀溺的问话是:“子孔丘之徒与?”就没有那个“是”字。可以不可以说,“是”字是后人加的呢?很可能!“是”字作为一个系词,今天看书看报,满纸都是。但是在上古可不是这样,得辛辛苦苦地去找,很不容易找到一个例外。

文字也要注意社会性。我们说先秦时代“悦”字是“言”旁,不写作“忄”旁。如果先秦有“悦”字,《说文解字》就应该收它。没有收,可见没有^①。可是偏偏《孟子》中就有它,《庄子》是两个(说、悦)都用。还有一个“懸”字。《说文》中只有“縣”没有“懸”,可是偏偏《孟子》中就有“懸”字。怎么解释?我认为很可能是后人传抄产生的错误。这一点也不奇怪。现在我们印书,经过校对,还出那么多的错误,古人传抄就没有错误?那么,为什么《论语》没有“悦”字呢?因为它是“经书”,传抄的人不敢随便改。不是经书的,他就敢改。《孟子》虽然也是经书,但它是到宋代才上升为经书的,在这之前,人们也敢改。《孟子》里那么多“悦”字、“懸”字,就很可能是后人改出来的。不然,孟子那个时代没有的字,怎么会在书里出现呢?出现了,又有谁懂它呢?

再如“阵”,上古都写成“陈”。颜师古在《汉书·刑法志注》里说:“战陈之义本因陈列为名,而音变耳。字则作陈,更无别体,而末代学者,辄改其字旁从车,非经史之本文也。”但是我们编的字典、词典倒有新发现:“阵”在《吕氏春秋》里就有。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这就要用语言(这里是文字)的社会性来分析了。别的书里没有,《吕氏春秋》里有,《吕氏春秋》的作者能造出一个人家都不懂的字吗?颜师古连《吕氏春秋》也没有读过?不可能吧?

^① 宋徐铉《进说文表》还说:“悦,经典只作说”,“俗书伪谬,不合六书之体。”

上面说的是语言的社会性，这个原则非常重要，下面要说说历史比较法这个原则。

历史比较法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研究汉语史。不研究历史比较法，就研究不好汉语史。举例来说，历史比较法有一条：条件完全相同的语音，它不会忽然就分成两个、三个。音韵学家说，“家”古代要念成 gū。后来汪荣宝他们认为古代“姑”要念成 jiā。谁对呢？谁都不对。为什么？假如“家”“姑”在上古时代读音完全相同的话，怎么又会分成两个音的呢？这是说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研究历史比较法。对于古音的拟测，这个原理十分重要。高本汉尽管对上古汉语的语音拟测得不好，但是有一点应该肯定：他是接受了历史比较法的。他不会把“家”念成“姑”，也不会把“姑”念成“家”。

三、语言学和古代汉语

我从七岁启蒙，读的是文言文。先念《三字经》，接着就念《五字经》——我们家乡管《神童诗》叫《五字经》。什么“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家乡不兴念《百家姓》，所以我没念。老师说《四字经》——我们家乡管《千字文》叫《四字经》——太深了，所以我也没念。我们家乡那个地方很偏僻，没有机会接触什么古书，连《十三经》都没有，顶多是“四书”、“五经”，我好象只念过“四书”，非常闭塞。

后来我到亲戚家当了小学教师。有一家亲戚的父亲在广雅书院当过学生，家中藏书很多，可是这个亲戚不怎么读书，把书堆在一个房间里，堆得满地都是。我说：“你的书不看，可不可以借给我看？”他说：“难得。反正我也不搞这个，你拿去替我保存好了。”我就把整整十四箱书都搬到家里去了。这么一来，我就象进了宝山，发现了宝。那些书不只是“四书”、“五经”，连天文地理，甚